

● 前沿碰撞

比较文学方法研究及新世纪发展前景

[法]谢夫莱尔/钱林森

谢夫莱尔 (Yves Chevrel) 先生是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1999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在成都京川宾馆有幸拜访他,并就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形象学、文化研究、中法比较文学的发展及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趋势和前景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访谈。本文由我根据交谈手记整理而成,并经谢夫莱尔先生修改定稿。

——钱林森 2000年3月3日上海

钱林森(以下简称钱):我非常高兴在成都见到您。1985年您曾到深圳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仪式暨第一届大会。时隔十五年的今天,您又来到这里参加学会的第六届会议。您对此次会议有何感想?您有什么看法?

谢夫莱尔(以下简称谢):当然,首先我非常高兴在十五年后的今天回到中国并与当年结识的众多朋友重逢;另外我一直与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们保持着联系,因为他们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的表现越来越活跃。我也很高兴再见到您,钱林森先生。1996年您在南京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当时是您去接我的。

我对成都这次大会的第一印象是,从会议日程中我发现了中

国比较文学研究极大的活力,它从1985年的深圳成立大会以来已经建立起了自信和权威。

钱:1985年在深圳,您曾发表了一篇演说,主题是把接受理论应用在比较文学中的可能性;您尤其建议中国的研究者们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和分析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关系。就是在您的这个启示下我撰写了《法国作家与中国》。您在索邦大学指导的几位中国研究者,他们的论文都是建立在接受研究理论基础上的,比如金丝燕的《法国象征主义者在中国》、林治伟的《茅盾与自然主义》。在您和P. 布吕奈尔(P. Brunel)共同主编的《比较文学简论》(Précis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中,您还就“接受研究”撰写了一个章节。这是不是意味着接受美学是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方法呢?那么影响研究呢?

谢:可能我在准备我的题为《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在德国(1865-1893)》的国家博士论文(1979年答辩通过)时,已经接触到了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并且还考察了从影响研究向接受研究的转变,这在我看来是必然的。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各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们就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了,只是当时尚未使用“接受”这个词。我们在第一部真正的比较文学教科书——保罗·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编著,于1931年出版——中找不到这个词;当然,作者在书中谈到了接受者、发送者、传播者,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有必要用除了“境况”、“结果”或“影响”以外的词来概括这些研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确实更加关注法国文学可能对外国作家造成的影响而忽略了它可能受到外国作家的影响。总之,一种主要建立在影响概念基础上的方法在我们国家得到了发展:1968年,在一篇题为《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纲领性论文”中,S. 热纳(S. Jeune)写道:“对起源、结果、境况、声誉、神话的研究都可以用一个含义最广的词来归纳:影响”(第43页)。然而,几乎在同一时代,在德国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康斯坦斯(Constance)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H. R. 姚斯(H. R. Jauss)和W. 伊泽尔(W. Iser),他们为把Rezeption(接受)和